

物化、辩证法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架及其影响

李庆钧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它对当代西方许多哲学家影响甚深。虽然卢卡奇自己后来也曾多次自我批评这本书，但不可否认它是卢卡奇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特别是其中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蕴含了卢卡奇历史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架，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用“物化”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其自康德以来的古典哲学的性质；其二，用“辩证法”来说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在辩证法中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张力；其三，用“阶级意识”来分析无产阶级冲破资本主义的物化帷幕和获得解放的条件。这个基本构架及其主要思路与倾向对后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甚深。下面我们就详细研究一下这几个方面。

一、物化——资本主义的普遍现实

卢卡奇是从商品结构开始分析物化的。他主要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为依据，即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¹，剖析了商品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正统治作用，也就是说卢卡奇分析物化现象首先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④即商品拜物教问题开始的。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已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普遍形式和真正的统治形式，而商品结构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④，由于这一事实，就产生了物化，即包括客观方面的物化也包括主观方面的物化。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规律与人相对立；在主观方面，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了一种商品。

其次，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物化现象。他认为合理的机械性和可计算性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是物化过程的标志。随着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程度增强，工人的“质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合理化的可计算原则使得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客体方面，产品本身的有机的统一被破坏了，生产过程变成“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1/4}；在主体方面，它已不再表现为是生产过程真正的主

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1/2},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3/4},从而生产的机械化把人变成了孤立的原子,本来是主体的人被贬为客体,对现实只能采取被动的静观态度。

第三,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不只在经济层面上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其它所有领域中都存在。在科学、法学、经济学、艺术、新闻界等都存在物化意识。物化涵盖了整个资按义社会外在的与内在的生活,充斥整个文化意识领域,并深入到人的肉体与心灵中去。

第四,卢卡奇从物化的基本论述出发,分析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认为近代批判哲学就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⑧。近代批判哲学主要是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一方面要解决自笛卡尔以来理性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批判哲学实际上又重新陷入困境。卢卡奇认为康德以来的形式理性主义面临着“自在之物”的困境即“作为普遍的方法的理性主义就必然要求建立体系,但同时对于一个普遍的体系的可能性的条件的反思,也就是体系问题的有意识的提出,又说明了这样提出的要求的不可能性,即是不可能实现的”⁽⁴⁾。德国古典哲学之路就是为了寻找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的方法从而奠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辩证方法的基础,其结果是“从同一的主体—客体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⑨,古典哲学必须“发现和指出那个‘行为’主体,现实的具体总体可以被把握为是这个主体的产物”¹⁰,古典哲学的倾向就是要“力求克服主体的物化的分裂及其客体的——同样是物化的——僵硬和不可理解”¹¹。黑格尔接近于问题的解决,但“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它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¹²。结果是,古典哲学“本来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¹³,只有古典哲学的推演方法,即辩证的方法才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

二、辩证法——批判物化的张力之源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个“圣”书的注解,而仅仅是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本质是总体观点,是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的方法,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

但是机会主义、实证主义坚持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实。卢卡奇认为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一是不能从总体观点把握现实。这种方法崇拜“事实”,停留在直接性的表面,把作为总体的事物孤立化、片面化,不能理解中介的作用。二是不能从历史观点把握现实。这种方法看不到作为总体的事物是具体的、历史的和过程性的,而坚持用静止的观点来看事物。所以这种纯“科学”方法实质上是背离了辩证法的核心本质,它只能加强而不能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

那么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完全能为批判物化提供张力之源了?卢卡奇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

演。”¹⁴ 它没有能找到行为的主体即“同一的主体—客体”——无产阶级。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具有真正革命的本质,才成为扬弃异化的张力之源。

归纳起来,卢卡奇对辩证法的阐述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总体与中介。

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是辩证方法的本质,只有从总体观点出发,才能把社会存在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¹⁵,而且,“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¹⁶。各个环节与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构成总体的中介。这样总体与中介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机会主义与实证主义的错误。卢卡奇认为,对直接性的崇拜、对中介的否定只能导致“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¹⁷,而社会总体存在于通过中介产生的复杂性中,“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¹⁸。这样就能把社会存在了解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就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由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¹⁹,所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²⁰。

第二,本质与现象。

正是由于中介的作用,认识就不能停留在现象的直接性上,而应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之中去。机会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运用的是理想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他们把事物的本质归结为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示的纯粹数量,从而认为“‘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²¹。卢卡奇认为他们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从而在他们那里,“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²²。要破除这种假象,就不能把总体当作不科学的东西抛掉,也不能把各个孤立部分的反思联系当作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正如卢卡奇所说:“我们需要辩证方法来戳穿这样产生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²³。

第三,主体与客体。

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也规定主体。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科学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而只能产生“一些无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²⁴。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有两个前提,即“要把总体既作为被设定的对象又作为进行设定的主体”²⁵,所以这个总体就是同一的主体—客体。资产阶级科学坚持直接性的方法论,其后果是“主体和客体僵硬的对立”²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就是同一的主体和客体,在直接性上,即“无产阶级只意识到商品关系时,它只能意识到自己是经济过程的客体”²⁷,但在“流动的过程”中,即“如果资本的物化被熔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停的过程”²⁸,无产阶级就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主体。“流动的过程”的观点是辩证方法的观点,这种方法把“客体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为一个流动的过程”²⁹,从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及一切“科学”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真正的行为主体、“创世的‘我们’”、“同一的主体—客体”即无产阶级。

卢卡奇据此批评恩格斯忽略了“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并将它置于“方法论的中心地位”³⁰,辩证方法就不再是

革命的方法了。所以,总体与中介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的分析最后都要落实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因为“对辩证方法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³¹。

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冲破物化的保障、革命与解放的前提

卢卡奇认为,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意识决定的,“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位置。”³²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不同,“这同一个存在使资产阶级被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³³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出发点就是“简单地接受直接既定的(即经验的)社会结构”³⁴,但是“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³⁵,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在于发现这种中介范畴的作用,正如卢卡奇所说,“中介范畴的方法论作用在于借助它们,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客体必然具有的,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没有得到直接表现的,以及相应地在资产阶级思想中必然没有得到反映的那种内在意义,在客观上发生作用,并因而能提高为无产阶级的意识”³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对其自身的社会地位的认识因而同时也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是“客观上更高级的科学认识”³⁷,所以,它能达到对总体的真正联系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露和破除资本主义商品物化结构的假象,发现“每一种商品的内核,即人与人的关系”³⁸。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已不仅是一种理论的认识,也是一种实践的认识。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拘泥于商品拜物教的范畴,因此把人与人的关系的作用合理化成一成不变的物的关系”³⁹。所以,虽然我们必须从直接性、从物化的规律性出发,但是只有消除了物化的直接性之后,那种被物中介了的人的关系才能被发现,这种消除不是纯思想的运动,而是一种对物化作为社会生活形式的实际消除,同时也就是一个历史过程;辩证法就来自这个历史过程并被人们所认识,而这个认识的意识过程是由无产阶级来体现的。

卢卡奇在谈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不是指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受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指它们的平均值。因为对无产阶级个体来说,物化的直接性是不可消除的,只有“阶级(而不是‘类’,类只是按照直观的精神塑造出来的神秘化的个体)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⁴⁰。无产阶级虽然从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和资产阶级一起陷入了存在的直接性之中,但是“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⁴¹,所以只有无产阶级“代表真正的现实,即正在被意识到的发展倾向”⁴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反映的是从资本主义的辩证矛盾里迸发出来的积极的和新的东西,这种东西由于无产阶级的行动就由抽象的可能性变成了具体的现实。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辩证法在卢卡奇那里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的理论批判张力,而阶级意识则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实践批判前提,辩证法与阶级意识的结合构成了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点。他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分析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而辩证法又来自历史本身,来自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的客观历史,所以阶级意识是“客体的自

我意识, 意识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⁴³ 这就说明卢卡奇怀有强烈的黑格尔主义的情结。

四、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批判理论对后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影响甚深, 法兰克福学派就把这本书奉为圣书。毋庸置疑, 这本书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 反映了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色。卢卡奇用物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进行了深刻批判, 他“第一次把异化范畴重新介绍到哲学文献中, 从而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的复兴”⁴⁴。自他之后物化(异化)理论就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 虽然他们对物化的解释已与卢卡奇不太相同。卢卡奇的理论特色对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工具理性批判。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具有双重维度: 第一重维度是从社会关系角度来分析物化, 即物化是从商品结构中产生的, 人与人的真正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掩盖了, 由此产生了物化的客观方面与物化的主观方面。第二重维度是从科学技术角度来分析物化, 即物化产生于由科学技术所决定的合理化原则中, 这种合理的、可计算原则一方面破坏了产品本身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主体被“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⁴⁵, 卢卡奇认为这种合理机械化和可计算的原则已遍及资本主义的全部生活的表现形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那里, 第二重维度被大大扩展和深化了, 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批判扩大为对整个文明的批判, 对理性的拷问变为对整个启蒙理性的否定。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就认为工艺的基本原则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 科学的进步意识着人的非人化过程的加剧, “旨在启蒙的技术能力的进步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⁴⁶。马尔库塞也说: “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等式: 技术进步= 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奴役的扩展。”⁴⁷ 他又说: “机器不再是中性的, 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⁴⁸ 这样来看, 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对人的奴役与统治, 物化就是植根于我们文明之中的、很少有人能摆脱它的命运。这样, 在卢卡奇那里克服物化的乐观主义就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的悲观主义。

第二, 作为规范性范畴的总体与否定的批判的方法。

总体既是认识性范畴, 也是规范性范畴, 它是认识资本主义现实的方法, 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规范。总体成为卢卡奇浪漫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 非总体的人就是物化的人, 用总体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就会发现人的物化。因此, 反对人的物化就是反对人的碎片化、孤立化、非人化, 就是要恢复作为人的总体。所以在卢卡奇那里, 用辩证法来批判现存社会, 就是用总体性来否定物化; 这种以总体为规范的否定与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几乎成为其干预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原则的核心。在法兰克福学派如马尔库塞和弗罗姆看来, 物化已表现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全面异化、“总体异化”; 为了克服这一异化状态, 马尔库塞认为要进行总体革命, 即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变革, 还要克服人的本质的歪曲, 使人作为完整的人全面占有和复归自己的社会本质, 这才是人与社会的真正解放。弗罗姆也认为, 要消除总体异化, 必须进行总体革命, 才能达到消除异化的“健全

的社会”。他们都反对机器操纵人、机构统治人、人奴役人的非人现象；他们都希望消除异化、恢复完整的人的主体性。所以他们的学说与卢卡奇的一样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热情。

在卢卡奇那里,由于主要以总体性作为人道主义的规范范畴,其唯心主义已初现端倪;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那里,这种唯心主义的浪漫性就已成为对艺术与美的乌托邦的迷恋。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表现了一切革命的最终目标:个人的自由和幸福。”⁴⁹

第三,意识的哲学。

当哈贝马斯认为自己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中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时,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从卢卡奇开始一直到阿多尔诺基本上都囿于意识哲学的框架中。在卢卡奇那里,他把理论与实践同一起来。他说:“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就是说,这种认识使它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⁵⁰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理论分析所使用的概念被认为就是它们力图掌握的实在的组成要素。因而这些概念同时有助于改变实在、而自身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改变”⁵¹,因此,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都非常重视意识的作用。在卢卡奇那里,意识(阶级意识)是冲破物化帷幕的保障,意识作为一种对总体性的渴望,同时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⁵²。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这种意识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同一的主体和客体的意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走向激进状态,他们充分重视主体(当然这时的主体已不是无产阶级了)的意识作用。在他们那里,对物化的批判与对总体性的揭示,是理论家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理论家的理智直观透视。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就在意识哲学上走向了精英主义。革命的主题依然存在,不过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作用更为重要,不过已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必然走向唯意志论,而唯意志论的激进主义的结局只能是悲观主义,从而走向乌托邦。

¹ 〃 » ¼ ½ ¾ ¿ À Á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5 50 52 卢卡奇著,杜章智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44、144、144、150、150、151、177、185、193、213、217、225、227、227、58、61、57、56、77、77、55、57、53、78、79、251、268、268、267、50、50、105、247、242、229、246、246、253、262、284、289、282、264、150、253、300 页。

⁴⁴ 转引自张西平著:《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73 页。

^{46 47} 转引自欧力同著:《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0 页。

⁴⁸ 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版,第 108 页。

⁴⁹ 陆梅林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6 页。

⁵¹ 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 页。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小娟]